

财富与贫困

〔美〕乔治·吉尔德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 020 5328 6

财 富 与 贫 困

〔美〕乔治·吉尔德 著

储玉坤 钟淦恩 杨思正 等译
张仲礼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George Gilder
WEALTH AND POVERTY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1
根据纽约基本图书出版社 1981 年版译出

财富与贫困

〔美〕乔治·吉尔德 著
储玉坤 钟淦恩 杨思正 等译
张仲礼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25 字数 259,000

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6,600 册

书号：4188·50 定价：2.10 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美国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所著《财富与贫困》一书问世后，曾受到美国供应学派的高度评价，把它称之为“美国新右派的资本主义宣言书”。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戴维·斯托克曼也为之鼓吹，并购书三十册，分送给里根总统的助手们，作为他们必读的经济理论著作。

《财富与贫困》是在里根标榜供应派的理论参加总统竞选时出版的，它正好给里根竞选时提出的“经济纲领”作了理论宣传，对里根的竞选获胜起了一定的作用。1981年1月里根在就任总统时向国会提出的经济咨文中，宣布了他的“经济复兴计划”，吉尔德参加了这个“经济咨文”的起草工作。从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里根政府所实施的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乔治·吉尔德生于1939年，曾在哈佛大学攻读文学，一度因考试不及格而退学。1959年复学，1963年获文学士学位。离开哈佛大学后，即赴华盛顿从事写作生涯。他曾为纳尔逊·洛克菲勒撰写演说稿，1964—1965年任外交委员会低级研究员，1965年任《新领袖》杂志副主编，1968年任尼克松的演说撰稿人。他本来是一位社会学家，专门研究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1973年出版《性的自杀》一书，激起了美国争取女权主义者的愤懑。后来他自学经济学，泛

读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各种经济著作。据他自己说，对他的经济思想形成影响最大的是：货币主义创始人米尔顿·弗里德曼、供应学派领袖阿瑟·拉弗以及经常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经济论文的欧文·克里斯托尔和旺尼斯基等人。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传统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为了反危机和解决失业问题，纷纷推行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种经济理论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同时产生了严重恶果，特别是1973—1974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都出现“停滞膨胀”的局面。凯恩斯主义无形中陷入了困境，并给市场自由经营论以卷土重来的机会。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兴的供应学派成为英、美等国政府的官方经济学。这两个经济学流派在理论和政策方面大同小异，都属于保守主义的新型自由经营论，均以“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的萨伊定律为理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因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攻击福利国家政策。吉尔德就在这种经济思潮的影响下成为美国供应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从吉尔德的思想渊源来看，他的经济思想是属于保守主义的、新型的自由经营论者。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吉尔德的保守主义立场。

吉尔德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也就是里根政府主张的政策思想，如削减福利、减税等。吉尔德认为美国的福利制度和高税收破坏了家庭，使人们懒惰成性，阻碍企业家去冒险，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吉尔德削减福利的

主张使美国广大的劳动人民受到打击，而减税的主张却大大有利于美国的垄断资本家。难怪吉尔德的书一出版，就受到美国统治阶级的喝彩。

美国统治阶级褒扬吉尔德的这本书，还因为他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赞颂资本主义为人类“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又攻击社会主义。例如他在书中写道：“和家庭一样，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资本主义就不是那种会过时或衰败的制度”，“自由本身是美好的，而且还给我们带来富裕；可是集体主义却造成奴役和贫困”，等等，甚至说什么“台湾、南朝鲜和其他繁荣兴旺的亚洲经济，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使之有利于资本主义，它们虽然经历了长时期通货膨胀，然而其经济以世界领先的速度增长着，并取代毛泽东主义而成为亚洲的典范”。由此可见吉尔德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偏见。

鉴于本书多少反映了美国当前的一种思潮，代表了美国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观点，对了解和研究里根的经济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将此书翻译出版，以供我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其他读者进行研究、分析和批判。

本书第一章至第三章由张睿壮同志翻译，第四章和第五章由吴玉同志翻译，第六章至第十二章由储玉坤同志翻译，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由钟淦恩同志翻译，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一章由杨思正同志翻译。全书由张仲礼同志校阅。译校者限于水平，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储玉坤

1984年7月

序

财富与贫困是经济学主要关心的两个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太广泛、太重要了，不应仅仅由经济学家们来探讨。尽管经济学家们向我提供了一些最值得我重视的意见——我要对他们中许多人表示感谢——这本书就部分来讲，是一篇评述当代经济学在分析所有经济部门的创造力和进步的来源时所出现的局限性的论文。

社会学家们对这本书也作出了贡献，我要对其中的几位表示谢意。但我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涉及到看法上的一些严重曲解，这些曲解是由于社会学讨论社会时的习惯做法所引起的。这种做法主要把社会分成各个部门，分别地用统计的方法加以研究。它把社会分成：穷人、富人，女人、男人，工商界及劳工。

这本书是在我的早期著作《看得见的人》的基础上写成的。那本著作基本上是我在社会学方面的一个尝试，是通过研究穷人来了解贫困问题。它是根据我对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的几百个穷人的采访写成的一部非虚构的小说。我从这些涉及自由主义项目对穷人的破坏性影响的调查研究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也许是：凡没有包含财富理论的贫困理论都是不完全的。因此，《财富与贫困》开始时的书名是《贫

困研究》，但结果却成了对经济增长根源的分析。

对我早期分析作出过贡献的人，已在早期的一些著作中致谢过了。现在我只想顺便提一下，如果没有这些早期著作和以前进行的研究，这本书根本就不可能写成。我之所以能深入经济学领域并取得较多收获，就是由于我以前专心研究过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文献（从玛格丽特·米德的《男人与女人》到史蒂文·戈德堡的《父权制的必然性》）。

尽管如此，本书仍有它的特殊范围和特点，这是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获得的。十年前我从读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开始研究经济学，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又研究了熊彼特和凯恩斯的著作，后来又研究了有幸被称为当代经济学家的“供应学派”。

象财富的创造一样，智力的进步并不是正常地以专业部门所喜爱的那种合理的逐渐增长的方式取得的。我认识到，同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艾恩·兰德和威廉·巴克利一样（他们在形成我早期的经济思想的时候，都曾普遍地受到嘲笑），阿瑟·拉弗、欧文·克里斯托尔和裘德·旺尼斯基等人，甚至在给我教益最多的专业经济学家之中，也都不是受欢迎的人物。很巧的是，这些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过最大贡献的“优秀的”或者说是“有判断力的”经济学家，都往往夸大经济学的科学精确性，并且都是这样提出自己观点的，即他们都未能抓住资本主义的高度冒险精神和赎罪救世道德。甚至亚当·斯密也过分强调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自私自利，而不是利他主

义的创造精神。

无论如何，克里斯托尔和旺尼斯基二人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也在《华尔街日报》评论专页里，还有沃伦·T·布鲁克斯在《波士顿美国人先驱报》他才气焕发的专栏里，都使我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了一种感情，使我永远消除了以前对这门沉闷的科学所具有的害怕心理。尽管我也象许多人那样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政治模型”感到不安，但旺尼斯基的著作《世界如何顺利运转》在经济学的文献中却是一部令人欢欣鼓舞的巨著——一本照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的传统写成的书——而我的这本书在许多方面就是遵循了旺尼斯基大胆开辟的供应学派道路而写成的。我还要向裘德·旺尼斯基和内森·格拉泽两人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在审读了我这本书的潦草的初稿之后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所有的作家迟早都懂得：只有最好的朋友或者亲密的伙伴才会乐意提出那种为所有作家都需要的难以对付、入木三分的批评。杰弗里·贝尔对共和党政治的巨大影响还只是刚刚开始被感觉到，他仔细通读了本书，使本书最单薄的几章得到了充实和加强。按理我应该甚至更多地接受他的锋利无比的（换句话说说是切中要害的）忠告。

同我在这里向之表示感谢的许多人一样，戴维·沃什也会以极大的热情接受我以作家身份提出的保证：本书中所有的见解（和错误）都由我一人负责。尽管如此，他的一些论点是很容易在我的书中找到的，其他不那么明显的忠告和鼓励之词也是不胜枚举的。

我认识汤姆·贝瑟尔虽然只有几年，但是看来他已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编辑方面所提出的意见和批评，实际上对本书的每一章都有重大的影响。其他的初稿审读者和提出有价值的批评的人包括保罗·克雷格·罗伯茨和汤姆·布雷，他们当时都在《华尔街日报》工作；迈克尔·布鲁尔，他教我经济学已有十多年之久，我希望他对自己学生的著作能感到满意，尽管该书会有脱离常轨之处；马萨诸塞州大巴林顿美国经济研究所的拉里·普拉特，是一位精明老练的审稿人，他指出我论点中的缺陷，其速度之快，超过我能填补这些缺陷的进度；还有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克里斯托弗·德·马思。

在本书送出付印之前，我十分幸运能够遇到戴维·斯托克曼。众议员斯托克曼在美国国会中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他对本书提出的深刻批评和具有说服力的修改意见——尽管他的时间十分紧迫——使我感激不尽。尼尔·豪正在同斯托克曼合作撰写一本重要著作，在我这本书最后完稿时，他也给我提出了关键性的意见。

其他审定全部或部分原稿的人还有比尔·哈默特和林恩·米德尔维恩，我与安东尼·费希尔一起在纽约经济政策研究国际中心工作，这两人是我亲密的同事。这个国际中心为我最后写成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学术环境。

本书的某些部分最初曾以杂志论文的形式出现，这些论文受到欢迎，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哈泼斯》杂志的刘易斯·拉帕姆和马修·史蒂文森对我写出最后几章起了特别

重大的作用。杰克·肯普和罗纳德·里根作出的反应，都提醒我注意到共和党政治家在美国的抬头，他们迫切需要和热烈欢迎各种意见。

尽管本书所表达的思想被视为“保守派”思想，但是这些思想都是我从各个“自由派”方面的政治教育中搜集得来的，象《新领袖》杂志和里庞社、肯尼迪政治研究所、查尔斯·马赛厄斯和雅各布·贾维茨两位参议员的办公室以及纳尔逊·洛克菲勒的三次总统竞选。纳尔逊·洛克菲勒是美国的一位伟大领袖和爱国者，他的竞选失败超越了一切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通常范畴。里庞社的三位主席乔赛亚·李·奥斯匹茨、布鲁斯·查普曼和约翰·托平都曾积极参加历次辩论，本书就是从这些辩论中产生的，奥斯匹茨并对本书的最后几章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理查德·拉恩和马克·布卢姆菲尔德（他们也是里庞社的成员），在我之前就走上供应学派的道路了。我相信《财富与贫困》的中心主题——有必要给予穷人以自由和机会以及家庭和信仰的价值观念，它们对于一切财富和进步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中心主题。可是今天，一个极大的历史的嘲弄是，菲利斯·施拉夫莱、康尼·马什纳、埃德温·福伊尔纳、杰克·肯普以及“新右派”的其他一些人都成了美国穷人最好的朋友，而自由主义却给穷人家庭套上了新式的奴役和新型的道德堕落。

布鲁斯·查普曼和萨拉·查普曼以及他们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无数朋友为我提供了这样的环境，四周远处围绕着闪闪发光的流水和白雪皑皑的山峰——有市区派克街

口市场买来的美味食物佐餐，还有凡松岛上的黑色冷杉和驯良家畜为伴——我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完成了本书的大部分。我珍视他们的友谊和慷慨，并希望我的这部作品不致使他们过分不安。我还要感谢迈克·威廉斯和伊迪丝·威廉斯，他们招待我住在他们凡松岛上优美的农场里。

罗德·吉尔德和梅丽·吉尔德对于书中以极为粗糙和乏味的形式，在晚餐或早餐时，或是在深更半夜时，向他们表达的许多思想，不得不保持极大的容忍。同时他们对于作者的一些奇异想法从不计较，大大超过了他们作为家属所应负的职责。我一直感谢他们对我的种种服务，有些我甚至已经记不起来了，更不必说报答了。

每当我自己缺乏信心的时候，戴维·洛克菲勒和佩吉·洛克菲勒总是对我表示信心十足——他们对我的信任使我对水平的标准和可能性有所领悟，这不仅扩大了我生活的界限，而且也提高了我生活的目标。所以本书是从我内心奉献给他们的一份礼物，也是奉献给戴维·洛克菲勒同我父亲的友谊的一份礼物。这种友谊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他们对我的无限爱护和慷慨也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本书是米奇·台克特在基本读物出版公司经手的最后一本书；她的工作象往常一样总是很出色的，而且她对我的支持也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打字员是萨莉·伯格曼斯（她还是能干的编辑）和伯尼斯·奥尼尔两人。

我的家庭是我现在所以成为这样和能成为这样的人的源泉，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和吉利给我作出的榜样和她们对

我的爱护；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妮妮，她给了我活着的理由
并给我指出了生活的道路，还给我生了路易莎。

乔治·吉尔德
马萨诸塞州 蒂林哈姆
1980年7月20日

目 录

序	1
---------	---

第一篇 资本主义的使命

第 一 章 胜利的挽歌	1
第 二 章 遭受挫折的经济	11
第 三 章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31
第 四 章 供应学派	43
第 五 章 财富的性质	71
第 六 章 贫困的性质	98
第 七 章 企业家的前途	115
第 八 章 阶级的冲突	132
第 九 章 同财富作斗争	148

第二篇 政策的危机

第 十 章 自由主义的道德危险	159
第 十 一 章 即将到来的福利高潮	173
第 十 二 章 种族歧视的神话	195
第 十 三 章 就业机会的复杂情况	214
第 十 四 章 创造就业机会的幻想	234
第 十 五 章 拉弗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	261

第十六章	通货膨胀的状况	292
第十七章	服务业的生产率	317
第十八章	增长的迫切性	332

第三篇 信仰的经济

第十九章	能动的经济	355
第二十章	固执的酿造商	372
第二十一章	信仰的必要性	390

第 一 篇

资本主义的使命

第一章 胜利的挽歌

近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社会主义梦想的破灭。梦想总是在成为现实之时遭到破灭的，而五十年来以各种完全或不完全的形式存在的社会主义现实已经使空想家的梦幻变得无立足之地了。在美国，社会主义主要是在大学的讲堂和教区信徒会面的客厅里，在那些逃避外部现实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碰头会上占上风，而在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的理想在瑞典和坦桑尼亚、古拉格集中营和官僚主义的阴影下已失去了生气。

近代第二件最重要的大事是资本主义未能取得与此相应的胜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那些产生模糊不清但却依稀可辨的新思想的空气和运动的地方，如在高等院校和各种社团、政府和教会里，自由企业制度所获得的显而易见的成就似乎仍不如已遭背弃的社会主义理想那么吸引人。如果诚如人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在某种意义上讲已遭到理论上的破产和伦理上的覆灭，那末为什么资本主

义的形象看起来也是如此摇摇欲坠，似乎要栽进同一个历史垃圾箱中去呢？为什么同是那些作者，他们在驳倒鼓吹集体主义的论据时是那样令人信服，可是在赞颂自由企业制度时却总是带着几分近乎哀歌的声调，在撰写那些立场坚定的保守主义论文时总要用为他们所珍惜的信念唱挽歌的悲怆曲调来收尾呢？

尽管用了各种不同的和声以及改编的曲调来唱这些挽歌，但无可否认它们毕竟还是挽歌。说来离奇的是，那一群被奉为企业界救星著名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前途时，竟然使用了与某些尽管受挫折却仍然自信的“社会主义”辩护士们所惯用的同样的令人忧伤的语言。与此同时，那些属于“老右派”的知识分子通常总是完全回避如何使他们的哲学思想同经济学说协调一致的挑战，而且他们也同样可能会坦率地说，他们接受资本主义正在衰败这一信念。二十年来，威廉·弗·巴克利主办的《国民评论》周刊一直为捍卫自由经济制度而进行了卓越的战斗，它用与奉献给私人企业制度及其哲学几乎同样的热情和篇幅，来刊登反共的和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只要他们在文化上属于保守派就行。索尔仁尼琴和马尔科姆·马格里奇都是企业成就的激烈批评者，保守派们却在他们的先贤祠中给这两人留出了一定地位，这是当代资本主义中任何一位企业家和哲学家都无法与之媲美的。他们两人均不失为伟大的作家和富于灵感的基督教代言人，有时对他们的挑剔或许是离题的。尽管如此，对保守派来说，以某种同样的激情来否认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性